率。在《宋史·兵志》上，对水军的发展过程、组织编制、统率关系和用兵情况等都缺少记载。这次有八方水军印在澉浦一起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

一是南宋王朝，十分重视建立和加强水军。不仅注意长江防线，还加强了两浙海防，以保卫京都临安的安全。这次出土的军印中，在理宗年间（1225—1264年）铸造的就有定海水军第一将印（印六）、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印四）、澉浦水军第四将印（印五），加上原来已知的设在杭州的第三将（见南宋《临安志》），这四支水军正好在沿海连成一线，这是理宗时加强临安海防的有力措施。即使到了恭帝时，在灭亡前一年，也还把金山水军从地方军改为中央直属军。所以可以说，水军的建立和发展，是和南宋的兴亡相始终。

二是发展水军的方法，不少是采取母鸡下蛋、滚雪球的办法。如调明州定海水军去建立平江许浦水军，拨平江许浦水军来加强澉浦水军，在澉浦水军旁边又建立金山水军等，这样，在原来毫无基础的条件下，很快在全国建立了二十多支水军。

三是水军内部的组织，也和禁军一样采取置将法，每支水军置一将或几将。每将的人数，可能比禁军要少些，例如澉浦水军一千五百人，就置一将（开始为第一将，后整编为第四将）。明州水军二千人，分左右两将。所以每将人数大约是一千至二千人。对每支水军的长官，称统制或统领。有关金山水军的印四和印七、印八和印九，都两印同铸，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是水军的用兵方法，既分散各地，又分兵把口，每支水军都有一个基本驻地，并把地名冠在军额之上，同时所有水军都直属中央；由殿前司管辖，便于统一指挥。例如许浦水军，在孝宗刚建立时，一度曾“并归许浦”，这次出土的宁宗时铸的许浦水军印（印二），则已明确标明是“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了。

五　军印证实了澉浦是古代冲要之地

澉浦镇建于唐开元五年（717年）。当时有产盐和海上贸易二点，所以成为一个有名古镇。澉浦镇所在的海盐县，秦置，因产盐而得名。宋室南渡以后，迁都临安，澉浦成为京都的门户，其地理位置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显得更为重要了。开禧元年（1205年），建立了殿前澉浦水军，一千五百人。其作用一是防止金、元兵从海上进犯，保卫京都临安的安全；二是防止和镇压当地盐民和“海上啸聚”农民的反抗和起义；三是严禁海外贸易中的走私活动和夹带兵器，保证宋朝政府的外贸收入。因此，到宋末元初，澉浦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港口。

为什么九方宋朝军印会集中在澉浦一起出土？这也应从澉浦是一“冲要之地”来考虑。九方军印出土的地点，是在明代澉浦城的东南角，距东城墙60、南城墙180米，正是古水军寨的地点。军印距地表2.4米，周围有砖瓦，显然是一处窖藏。据明天启《海盐县图经》记载：“至元十二年，伯颜分军为三取临安，其东一军，沿江循海，取许浦、澉浦，以至浙江，董文炳率之。十三年正月，次乍浦，进至海盐，澉浦统制及县令皆降。”至元十二年正是德祐元年，和印八、印九的铸印时间是同一年。所以，窖藏时间应是在德祐元年铸印以后至第二年正月降元前后。当时元军大举进攻，宋兵节节败退，元军取许浦、澉浦，曾占领澉浦海口，所以许浦水军可能是一路败退而来。还有金山水军和定海水军，从地理位置看，有如澉浦的两翼，当大军压境时，就可能缩短两翼，集中一地以抵抗。所以，许浦、定海、澉浦、金山这四支水军的军印得以集中一起，今天在澉浦镇出土了。

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

武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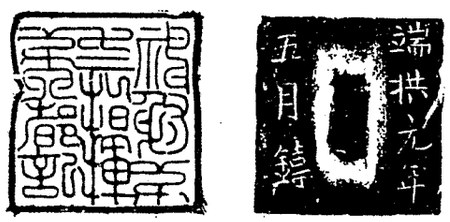
一　“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图一）

此印1972年在辽宁省凌源县北炉公社出土。青铜铸造。方形，长5.5、宽5.3、高1.5厘米。板状纽，纽高2.5、长3、宽1.1厘米。纽顶部有一“上”字。印面篆刻“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印背有刻款：“端拱元年五月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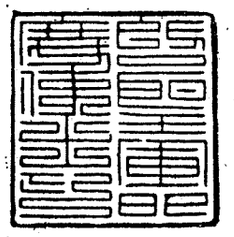
“端拱”为宋太宗第三个年号；“元年”为公元988年。“神射”是禁军中步军的一部分。《宋史·兵志上》“神射”注云：“神射，两浙州兵，旧号腰弩，雍熙四年改今名。淳化元年送阙下，选其强为广武，次等为本军。指挥五：陈留三、雍丘二。”熙宁三年废。按此印为十二指挥，与《宋史》所载不符，可正《宋史》之失。

二　“启圣军节度使之印”（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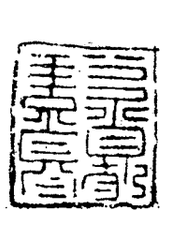
此印1972年在辽宁省阜新县知足山公社娘娘营子大队出土。铜铸。方形，长6、宽5.7、厚1厘米。背有方形台，纽在台上，高1.4、长2.4、宽0.9厘米。顶部阴刻“上”字。印体呈覆斗形。印面平正，印文较深，篆刻“启圣军节度使之印”。



图一
“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及印背拓片



图二
“启圣军节度使之印”



图三　契丹文小字官印



图四　契丹文大字官印

据《辽史·地理志》载，“启圣军”为仪坤州军号。仪坤州为辽初所设，同时置启圣军节度使，隶属上京道。《武经总要前集·北藩地理·边防》云：“仪坤州即应天皇后所生之地。东至长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踏努河二千里，河至大水泊五十里。”据此推知仪坤州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的东北方向。即辽上京旧址东北二百里的地方。

三　契丹文小字官印（图三）

此印1972年在辽宁省盖县十字街公社高台大队出土。铜铸。长方形，长4.5、宽4、高0.7厘米。方纽，纽顶部稍呈圆形，通高2.4厘米。纽端阴刻“上”字。此印为契丹文小字篆书。印文待释。

四　契丹文大字官印（图四）

1964年辽宁省凤城县乌骨城出土。青铜质，铜胎内沙眼很多。印方形，长6.2厘米。背中心稍洼，无刻款。板状方纽，高2.6厘米。印文倒第二字在契丹文大字官印

中常见，与汉印中某某之印的“之”字意义相仿。其余待释。

五　西夏文官印（图五）

此印辽宁省博物馆1968年收集。铜铸。长方形圆角，长6、宽5.8、厚0.5厘米。长方板状纽，纽中部有一圆穿孔。通纽高2.8厘米，纽顶端镌一西夏文字。印背两侧有阴刻西夏文两行。

此印与罗振玉所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中西夏文官印形状、字体都一样，当为西夏文官印。印文待释。

六　“副总领印”（图六）

此印辽宁省博物馆1968年收集。青铜质。正方形，边长7、厚1.6厘米。方板纽已残，残高0.3厘米。印面镌刻“副总领印”四字。此印与《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的金代“副总领印”相同。

考《金史·兵志》：“元光间，时招义军，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也。然又外设一总领提控，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副总领应为其副职。总领之称始于元光间，正大二年取消。推知此印铸造年代不早于元光元年（1222年），不晚于正大二年（1225年）。

七　“东上阁门使印”（图七）

1977年在凤城县边门公社旭光大队附近凤凰山中出土。青铜质，印背多有沙眼，左上部锯去一角。方形，边长8.5、厚1.4厘米。板状方纽，纽高2.5厘米，顶部有一阴刻“上”字。印文篆书“东上阁门使印”六字，印失角处缺“门”字之左半。按宋、辽、金都有“东上阁门使”的官职。据《文献通考》，此职初为皇帝身边的奉仪官。从《宋史》又可见，东上阁门使后来还可以参预朝政，甚至挂帅出征。从形制、印文篆法及制作粗糙看，此印不似宋印也不似辽金印。出土地点与《东北古印勾沉》所载的“大辽尚书吏部之印”出土地点相近，都在丹东九连城一带。这一带曾经出土过几方年号无考的铜印，可能是金末元初耶律留哥等契丹族短暂政权的遗物。此印或亦为这一时期的官印。



图七“东上阁门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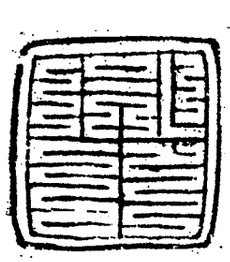
图八“兵马都提控印”

八　“兵马都提控印”（图八）

此印辽宁省博物馆1968年收集。铜铸。方形，边长8.4、厚1.7厘米。长方形板状纽，高3.3厘米，顶端有一阴刻“上”字。印背左边阴刻“兵马都提控印”六字，右刻“□巳年六月□七日”。印面镌刻“兵马都提控”六字。

以提控名官，盛于金代晚期，有提控、副提控、都提控、兵马提控等。此兵马都提控印当是较提控高一级的军官所用之官印。此印为金末元初之物。印背刻款只写天干地支，不写年号，盖因元初尚未按中原封建王朝传统建立年号，只用干支。

本文承李文信先生、朱贵同志等给予指正，并提供资料，在此谨表谢意。



图五　西夏文官印



图六“副总领印”

关于江阴北宋墓的墓主孙四娘子

朱瑞熙

《文物》1982年第12期刊载苏州博物馆和江阴县文化馆合撰的《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一文，报道了江苏省江阴县发现的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的情况，为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资料。但该文未能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探讨墓主孙四娘子的生平，对于孙四娘子和葛氏家族的关系缺少说明，甚至在“几点浅见”中还颠倒了葛诱和葛宫的祖孙关系。笔者不揣浅陋，根据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料写成此文，以弥补该文的不足，并就教于读者。

第一、关于孙四娘子的生平。该文由墓中保存的刻经《佛说观世音经》推断，孙四娘子“应属葛氏家族”。这一推断触及了孙四娘子与葛家的关系，但还没有弄清究竟是何种关系。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35《瑞昌县君孙氏墓志铭》（清乾隆五年刻本。四库全书本蔡襄《端明集》卷39亦收录此墓志），扼要记载了孙四娘子的生平，不仅有助于说明孙四娘子的身分，而且有助于考释墓中出土的器物。现将这一墓志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 “夫人之父、故礼部郎中、直史馆讳冕，在祥符间，少〔能〕直言，有声名，数更剧郡，治用严明，当世推重。夫人少丧母，鞠养艰勤。及既笄，礼部自负才称，又加怜幼女孤苦，必择奇士，得今尚书职方郎中葛君宫（公雅），遂以女归葛氏。初夫人之行，公雅年余二十，以文词中甲科，为州将幕官，指期可得贵仕。久之，回旋铨管，仅工（二？）纪，平居益邑邑不自得，或复慨叹。夫人曰：“为官穷通，岂不有命耶？”既而公雅升郎位，再以郊祀恩，封夫人乐安、瑞昌二县君。至和二年，公雅罢南剑州，夫人从还京师，道病发，亟命旋归，以三月二十日终于正寝，年六十。七月二十九日，葬江阴军江阴县化龙乡，祔于先茔。有子蒙，登进士第，处州缙云尉。女一人，未嫁。孙六人，曰逢，郊社斋郎；曰充；曰三老；女幼。夫人守礼法，动止有度，举族姻内外，无有不得其所。持生简约，使公雅能专意公家，而无锱毫扰于民，有内辅焉。喜诵浮图书。将终，遗戒薄葬祭之具，神情如平生，无有悲怛，盖妇人之难能者。铭曰……（下略）”（〔　〕中字系据《端明集》本。）

据此可知：（一）孙四娘子是礼部郎中、直史馆孙冕之女。孙冕，字伯纯，江西临江军新淦（今江西新干）人①。宋真宗咸平间（998—1003年），任直史馆多年。晚年知苏州，七十岁时自动致仕，在厅壁大书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退隐九华山，颇为士大夫所称道②。可知孙四娘子籍贯江西新淦，出身于仕宦之家。（二）孙四娘子是葛宫之妻。《宋史》卷333《葛宫传》记载，葛宫，字公雅，江阴人，死于熙宁五年（1072年），享年八十一岁。由此推算，葛宫生于淳化三年（992年）。墓志记载，孙冕认为葛宫是“奇士”，乃将女儿许